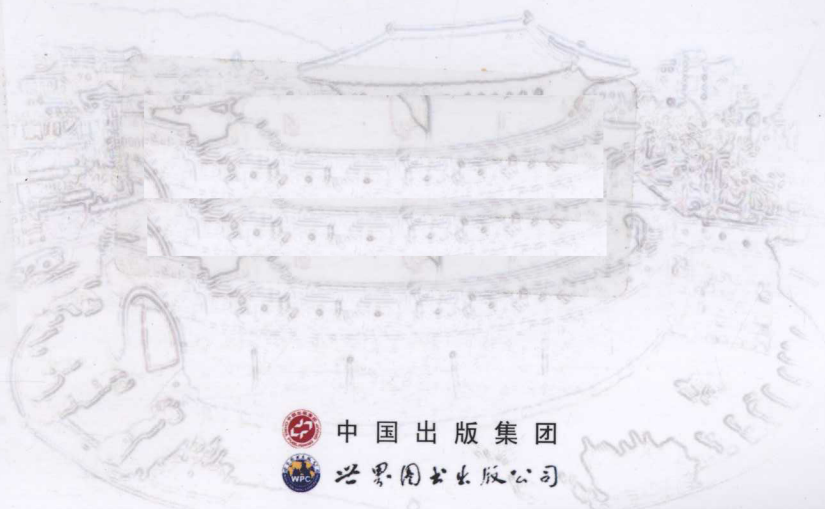


文库博士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文库研究项目

中韩近代 新小说比较研究

◎赵 杨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博士
文库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文库研究项目

中韩近代 新小说比较研究

◎赵 杨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赵杨著. —广州: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10
ISBN 978-7-5100-2884-7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 对比研究—中国、韩国—近代 IV. ①I207.42
②I312.6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5115号

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

策划编辑: 刘正武

责任编辑: 刘国栋

出版发行: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51969 84459539

http://www.gdst.com.cn E-mail: pub@gdst.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60千

ISBN 978-7-5100-2884-7/I·0215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咨询、投稿: (020) 84460251 gzlzw@126.com

序

在东亚各国文学史中，近代文学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与其不可替代的阶段性的创作成果和特色相比，迄今为止对它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需求，特别是以比较文学的视野去考察和探讨东亚近代文学演化规律的研究成果极其有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似乎是一门久遭冷漠的学科，其研究热情有点尚没有被点燃的感觉。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一大缺憾，给我们留下了较大的想象空间。赵杨的专著《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可以说是一部这方面的尝试性成果。

研究一门学问是一个复杂的探索过程，但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正确反映客观对象本质性规律的系统探索。人们所要研究的客观对象有大有小、有深有浅，但要摸索出其整体面貌、挖掘其中的奥秘，都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在中韩两国近代社会进程中曾经存在过的新小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的存续时间极短，作家、作品群体相对少一些，但作为社会由中世纪进入现代新社会的一个大转折时期的文学现象，它们的内容非常丰富，结构非常复杂，俨然成为一个文学独立的阶段性体系。对于我们从事东方文学或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如果要想使自己了解这一时期文学的本质及其特性，掌握使之“所以然”的规律，发现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最好是去整体地把握这一时期的新文学乃至新小说，熟悉其来龙去脉。从这个意义上讲，赵杨的这部专著也

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系统的参照系。

这部专著以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为其时代背景,深入探讨了两国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这一段时期是东亚历史发生大变革的“激变时代”,也是东亚各国文学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新时期。在中国,随着光绪年间的改良运动,古典小说领域也开始出现了新的迹象。这个时期前期产生的侠义小说、狭邪小说等,虽然对社会上的种种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这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没有彻底摆脱过去小说的局限性,表现为其余波的范畴之内,它们早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审美倾向。能够代表这时期小说创作新面貌的作品,是主要发表在《新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等当时文学刊物上的新小说。这些新小说和理论文章一反过去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把小说看作是揭露社会黑暗,宣传新思想的有力武器。随着商业货币经济发展而出现的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广大市民阶层对小说的审美需求,出版、报刊业的迅速发达,外国文学的大量输入和翻译,职业小说家的出现等,这些都合力促成了当时中国新小说的兴盛。

对韩国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艺术上的特色,进行系统的考察和深入探讨,从而勾勒出它在韩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阶段性轮廓,是赵杨这部专著的一个理论亮点。这是过去的学术界了解较少的一个分野,也是我们有必要去认识和探索的,从而弄清东亚近代小说发展乃至相互影响规律的重要方面。韩国的新小说,是其开化运动的产物。19世纪下半叶,英、美、法、日等西方列强依靠其先进的科技优势,强行扣开韩国的国门,使韩国开始受到近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震颤和洗礼。在这样的“时代变局”之下,韩国的开化文学慢慢拉开了序幕。1905年前后出现

的爱国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新诗歌、新小说的文学风潮。其中的新小说，是在摆脱中世纪小说惯性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革的产物。它在内容上以写文明开化为主，揭露社会黑暗，宣传新思想新事物，反映民族独立、自由恋爱等思想，体现出了时代发展的正面要求。在小说的艺术形式上，它打破韩国中世纪小说的那些才子佳人一人一代记式的、苦尽甘来皆大欢喜式的、汉文死板一条式的结构模式，采取了艺术情节和描写相对自由的、谚文一致的、由国汉文混用到国文专用的小说形式，以迎合各阶层广大读者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步骤。这一时期的新小说，在“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家庭小说”、“爱情小说”、“伦理小说”的名义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以发表在进步刊物的李人植的《血之泪》、《鬼之声》，李海潮的《鬓上雪》、《自由钟》等为代表作，这些新小说都具有鲜明的近代启蒙色彩。在小说观念上，爱国启蒙作家反对传统儒家把小说看成“惑世诬民”、“作奸诲淫”的“雕虫末技”，认为“夫小说者，感人最易，入人最深，与风俗、阶级之教化关系甚密，以一国盛行何种小说，视其国人心、风俗、政治思想之如何”（朴殷植）。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大转折时期，也是文学推翻过去、立足现实，展望未来的大转变时期。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生、发展中的这些内容和基本精神，也是赵杨这部专著的基本立脚点和之所以能够加以比较研究的事实依据或根本出发点。

在对两国近代新小说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赵杨打破过去东亚比较文学研究中曾经存在过的影响研究的惯性，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诸多事实论证了两国文学在东亚近代社会变革的现实关系之下，逐步渐行渐远、独立发展的过程。并以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证了在两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文学传统基础

之上的新小说的趋同性和差异性的表现规律。著者认为：“近代中韩两国的文学关系与中世纪不同，不再是一方处于强势地位和作为完全的文学输出国，而另一方作为输入国的单纯的影响关系。从这一时期开始，中韩两国的文学开始进入平行发展阶段，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着裂变。因此对中韩两国新小说的比较，不是要片面地探求两国小说间的事实联系，更重要的是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寻求两者间内在的价值联系。”这种认识是符合事实的、正确的和难能可贵的。有了这种认识，使得这部专著更具创新意蕴，还让我们对它产生更大的期待感。

在东亚，古典与现代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跨越的大转折时期，它就是近代。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看，它活像是一座不可替代的富矿，潜藏着无穷的、充满诱惑的学术宝藏。在这个近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中韩两国共同走过了非常相似的历史过程，但因为政治的、地理的和外部强权的原因，又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在两国这段文学历史的深处，都埋藏着大转折时期文学审美魅力的全部密笈。在这样的本质性问题上，对两国近代新小说进行比较研究，无疑具有莫大的学术意义。正如赵杨在其绪论中所说的那样，“近代是各国文学转型的关键时期……将两国新小说置于比较文学这一大的观照背景和参照系统中，不仅有助于准确揭示新小说的价值和特点，也可以在两国文学的比对中，更清晰地认识到近代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与世界文学的差距，因为评价一个国家的文学成就只有将其置于比较文学的大背景之下才能取得绝对意义上的公正”。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出版不论对作者本人，而且对学术界都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我与作者有三年的师徒之谊，我本身也

对中韩两国近代文学的比较研究颇感兴趣，拿其中的许多学术问题曾与作者交流过无数次。因为有了这样的一层特殊的师徒关系和切磋之过程，当赵杨试图以此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并准备确定选题计划时，我毫不犹豫地给予了赞同和鼓励。正因为如此，如今我有幸成为了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尝到了先读为快的快感。目前，赵杨正处于教学和学术进步最快的发展阶段上，她对学术界的贡献决不会止于这部专著的范围，相信她的更加成熟而辉煌的前景是可以期待的。

李 岩

2010年6月于北京自如斋

目 录

绪论 “新小说”释义及其他	1
第1章 中韩新小说的萌动	16
1.1 两国近代的历史背景	16
1.2 传播媒体的推动	20
1.3 新教育带来的广大受众	26
1.4 域外小说的冲击	31
第2章 中韩新小说的历程	40
2.1 政治小说——以政论入小说	41
2.2 社会小说——以时事入小说	57
2.3 言情小说——以儿女情长入小说	81
第3章 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式的变化	94
3.1 新小说观念的演变	94
3.2 新小说文体的渐变	104
3.3 新小说技法的创新	113
第4章 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形成的内外因素	126
4.1 各自文学传统的力量	126

4.2 中韩文学最后的师承	131
4.3 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	138
4.4 身为报人的新小说家	144
 第5章 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	157
5.1 新小说的“旧”——对传统的继承	157
5.2 新小说的“新”——两国小说的新起点	164
 参考文献	171
 附录：中韩新小说大事年表	185
 后 记	188

绪论 “新小说”释义及其他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韩小说渐渐摆脱了自古以来的文学边缘地位，成为文学的主流。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充斥着大量新的题材、新的事物和前所未闻的新概念，一时间有别于古典小说的“新小说”蔚然成风。中国近代新小说作品的出现大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①韩国^②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植《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

陈平原先生曾指出，“‘新小说’是相对于‘旧小说’而言的，时人自觉地把作为小说界革命产物的新小说和在此之前存在的中国传统小说（旧小说）区别开来。”^③这一论断说明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成果，但是事实上，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对别具特色的“新小说”的呼唤。

- ① 陈平原先生曾指出，中国近代新小说应从1898年讲起，“我把主要活动于1898至1916年的小说家统称为‘新小说家’。”（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并且补充论述道，“‘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虽然直到1902年才由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正式提出，但戊戌前后文学界对西洋小说的介绍、对小说社会价值的强调，以及对别具特色的‘新小说’的呼唤，都是小说界革命的前奏。因此，新小说的诞生必须从1898年讲起。”（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但是考虑到1902年之前主要是“新小说”理论的准备阶段而创作作品并不多，本书同时还要保持与韩国新小说大体相当的时间段以利于论述的展开，综合其他研究者的观点，因此将《新小说》创刊设为分野的界标。
- ② 本书将用到韩国和朝鲜两个称呼。韩国是1897年大韩帝国建立以后的称谓，之前延续的王朝称朝鲜王朝，因此指称新小说时用“韩国新小说”，而朝鲜则指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特定的朝鲜这个民族，如“朝鲜王朝”、“朝鲜民族”、“朝鲜半岛”。
- ③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1895年5月25日,《申报》上登载了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启”,文中曰:

窃以感动人心,变异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习气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①

此则征文启事,随后又登载于《万国公报》第七十七册(1895年6月)、《中西教会报》复刊第七册(1895年7月)上,只是少数文字略有差异。在这则启示中,傅兰雅对小说变异风俗作用的认识,与梁任公所论及的“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②可以说是“心有戚戚焉”;同时,寄希望于小说能够祛除积弊也与小说界革命中视小说为社会政治革命工具的观念不无关联。

此启示一出,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共收到应稿之作达162部,还因为作者过多,将原定的获奖人数从7名增至20名。但相比较当时应征的热烈程度,所做小说的水平却远未达到

① 见:潘建国:《小说征文与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第87页。

②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载《清议报》1898年第1册。见: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主办方的要求，傅兰雅在《时新小说出案》（1896年3月《万国公报》第八十六卷、《中西教会报》复刊第十五期）中又云：

本馆穷百日之力，逐卷批阅，皆有命意，然或立意偏畸，述烟弊太重，说文弊过轻；或演案希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虚幻，情景每取梦寐；或出语浅俗，言多土白，甚至词尚淫污，事涉猥秽，动曰妓寮，仍不失淫词小说之故套，殊违劝人为善之体例，何可以经妇孺之耳目哉？更有歌词满篇俚语道情者，虽足感人，然非小说体格，故以违式论。^①

从傅兰雅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头脑中有关小说的体例仍然不很明确，而且囿于传统的创作观念“故套”颇多，与真正的新小说的出现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但是这次征文活动初有启示、末有点评，做得有始有终，看起来虽然是傅兰雅的个人行为，但西方人的一些小说观念通过这次征文还是传达给了大众。而且据考证，在这次征文活动中及结束之后，仍有受该启事启发而作的小说面世^②，因此傅兰雅对“时新小说”、“新趣小说”的呼唤给当时小说观念及后期新小说产生所带来的影响仍不容小觑。

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新小说”的名字来源于日本1889年和1896年两次由春阳堂刊行的一种小说杂志。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后又将小说抬至“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小说

① 见：潘建国：《小说征文与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第89页。

② 《醒世新编》（1895）、《新辑熙朝快史》（1895）、《招隐居传奇》（1896）、《通商原委演义》（1897）等四部作品是“在征文启事的启示下创作的”。见：同上，第88页。

界革命。

受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晚清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个最繁荣的时代”(阿英),所产生的小说数量也成为无法精确统计的疑案。在新小说研究史上,先后有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江苏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王继权的《中国近代小说目录》等力图对这一时期的小说总量进行统计,但都未能穷尽。到目前为止,以日本樽本照雄先生所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以1902—1918年间发表的小说为主)中收录的小说最多,搜集的一书多种版本最全,其中创作小说(包括部分短篇小说)7466种,翻译小说2545种,共10011种,^①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

在中国《新小说》杂志创刊约四年之后,1906年7月22日,李人植的长篇小说《血之泪》开始在《万岁报》上连载,该小说被认为是韩国新小说的嚆矢之作。第二年3月7日,这部小说的单行本由金相万书铺发行,在它的封面上用韩文和汉文同时标记出“血之泪新小说”的字样,可以说这是韩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新小说”为名出版的小说。但是可以看出,当时所谓的“新小说”,从很大意义上来说还是书商和出版社为了适应潮流、招徕读者打出的广告用语,并不是作家主导的行为。而且据考证,在此之前的报纸广告中也曾出现过“新小说”的用语:

从1906年2月1日开始,《大韩每日申报》连续3天登载

① 《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1997年出版,2002年4月又由齐鲁书社出版《增补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增补本》共收小说19155条,比《新编本》条目增加了3141条。但因编者尚无剔除一书多种版本重复的具体统计,无法准确计算《增补本》所收近代创作小说、翻译小说的准确数。见:郭延礼:《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小说》,载《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35、39页。

了由日本人发行的《中央新报》的发刊广告，其中写道：“《明月奇缘》是汉云先生的著作，写才子佳人的相别再会，于一波一澜中尽显多情多恨，趣味津津，使读者不知厌倦，堪称现代杰作之新小说。更兼城山画伯之插画极尽婉丽，直现当场之境，使读者大呼珍哉妙哉。此栏目是本新报特色之一，从初版之日开始连续登载。”这里分明出现了“新小说”的用语。^①

这一考证可以证明，至少在1906年初“新小说”一词已经在韩国报刊中出现，而且所谓刊登新小说的“此栏目是本新报特色之一”，说明“新小说”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号召力，也适应了人们求新求变的心态。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韩国也与中国一样，人们习惯上把一些新出现的事物和现象冠之以“新”字，如新教育、新学问、新女性，在文学艺术领域则出现了新诗、新剧、新小说。究其原因，不过是人们把传统的、既成的事物都视为“旧”，而将新的、特别是带有西方色彩的东西都视为崭新的、具有创新性的，反映了当时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文化的排斥和对新事物的好奇和敬畏。

韩国新小说是由古典向现代过渡阶段的小说形式，从数量上来看有几百部之多，虽不能与同期数量惊人的中国新小说相比，但从整个韩国文学史来看，也是一个创作的高峰期。韩国新小说包括外国小说的翻案、古典小说的改作以及真正的创作作品，但即便是创作作品，也很难保证其中没有翻案的成份。就作者而言，也是数量众多，有卓有成绩的小说家，也有写过一篇作品之后就不见踪迹的无名之辈。而且在作者的署名问题上也是一片混乱，

① [韩]李在铤：《韩国开化期小说研究》，首尔：一潮阁，1985年版，第12页。

在版权栏上,有时一人既是作者又是发行人;有时干脆就不标明作者名字;有时在初版时明明标明了作者,但到再版或其他出版社重新出版时,又随意将出版人写成了作者,^①这些也反映了新小说起步阶段在版权问题上的一些无序状态。也因此,从现有的资料出发,可供研究的作者数量并不是很多。夏晓虹在谈到中国新小说时,也曾指出作者真实身份的确认十分困难,究其原因,“或是沿袭旧习,仿古代文人‘游戏笔墨’之意,以作小说为‘小道’,不肯现出真身;或是抱深忧,怀大志,嘲讽世相,痛言改革,以致鼓吹革命,‘笔无藏锋’,恐怕招来麻烦,落入牢狱,不得不隐去真名。”^②此种原因同样适用于韩国新小说的创作实际。

韩国新小说作家中成绩突出的有李人植、李海潮、崔瓚植、金教济,主要从事翻案创作的有具然学、赵一齐、李相协、闵泰瑗等。其中李人植作为新小说的代表作家创作了《血之泪》、《牡丹峰》(《血之泪》下篇)、《鬼之声》、《雉岳山》(上篇)、《银世界》等;李海潮的作品有《枯木花》、《自由钟》、《花之血》等20多篇,是当时最多产的作家,同时还有零星的理论片断发表;崔瓚植主要创作了《秋月色》、《雁之声》、《春梦》等爱情小说;金教济创作有《雉岳山》(下篇)、《显微镜》、《飞行船》等;安国善的《禽兽会议录》是一篇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寓言小说,此外他还发表有《共进会》,其中收录有3篇短篇小说。

总的来说,不论是中国新小说还是韩国新小说,都在国势衰微的存亡之秋以它所宣传的思想启蒙、自主独立、新教育、开发民智、婚姻自由、打破阶级界限等近代意识,以及文字上言文一致的

① [韩]全光镛等:《韩国现代小说史研究》,首尔:民音社,1984年版,第12页。

② 夏晓虹:《近代小说知多少》,载《读书》1998年第7期,第130页。

追求，成为各自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章。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新小说作家们作家意识的淡漠以及作品艺术性的欠缺，也使得新小说虽然比古典小说前进了一大步，但还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二

中国新小说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9年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都对新小说作了拓荒性研究。胡适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审视了前五十年文学（1872—1922）的历史变迁，指出“这五十年的下半（据郭延礼注，约指戊戌变法之后，也即是新小说阶段）便是古文学逐渐变化的历史”。《中国小说史略》末三章专门讲了“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清末之谴责小说”，划分了近代主要的三种小说类型，其中许多精辟的论断至今仍被研究者视为圭臬。陈子展先生则在他的论著中对三十年来（1898—1928）的“小说界革命”、“新文体”、“翻译文学”等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此外，郑振铎先生对此阶段文学也颇有研究，他不仅编选了《晚清文选》（1937），还写了《梁任公先生》、《林琴南先生》等长篇论文。

阿英先生的《晚清小说史》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晚清小说的断代史，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再版。该书从社会条件和文化因素的角度来描述和阐释晚清小说（1875—1911）繁荣的概况和原因，资料丰富翔实，对新小说的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此外，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安英的《民初小说